

# 一张韩庚照片,一部可变声手机 女生制造“魔力男友”报复老师

## 当事女老师始终被蒙在鼓里,先后借出20多万;被告人因犯诈骗罪获刑

一个初三女生,被老师批评了几句后,便产生了报复心理,利用男明星的照片与老师“谈恋爱”,骗得老师20余万元。昨天,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对这起雷人的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芳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非法所得17万余元责令其退赔。

□现代快报记者 陶展 通讯员 王磊

### 女老师的善意批评

1994年出生的王芳是家中的独女,2009年,王芳到射阳县某中学初三年级读书,李婷是王芳的英语老师,1977年出生。

即将面临中考,可王芳对学习却提不起一点兴趣,课堂上不是睡觉、看小说就是玩手机,穿戴、打扮上却格外上心,还与社会青年来往频繁。王芳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无法过问她的学习和生活。

李婷在学校任教多年,为人单纯,与前夫离婚后,将精力全部放在教学上,对学生要求很严。

一次课堂上,王芳又自顾自玩起了手机,甚至玩得笑出了声,影响了其他同学听讲。对王芳的行为,李婷进行了严厉批评。

王芳认为,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她,让她“很没面子”,甚至觉得李婷是看她“不顺眼”,故

意“整”她。

当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时,王芳渐渐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报复李婷,让她也尝尝被“整”的滋味。

### 女学生的“复仇计划”

2010年6月下旬,中考结束后,班上的学生都在焦急地等待中考成绩,王芳却开始实施谋划已久的“复仇计划”。她买了一张不记名的手机卡,发了一条短信到李婷的手机上。

当李婷回短信时,王芳说自己发错了,并问李婷是哪里人、干什么工作?毫无防备的李婷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和工作单位。王芳便谎称自己叫“杨军”,有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王芳在该学校读书,问李婷是否认识。李婷说真巧,王芳就在自己任教的班上。

第二天,李婷向王芳问起了“杨军”的事情。王芳承认自己母亲在婚前有个私生子,比自己大几岁,并称父亲不知道母亲的过去,请老师保守秘密。与王芳核实后,李婷对“杨军”的话深信不疑。

在随后的短信交往和网上聊天中,“杨军”自称是上海人,1979年出生,在上海某大医院做医生,家里世代从医,目前正单身,很喜欢有书卷气的女孩,并主动发来了自己的生活照。照片上的“杨军”阳光帅气,就像一个“明星”。

由于王芳对李婷非常熟悉,两人常常“心有灵犀一点通”,这让李婷觉得自己与“杨军”非常有缘分,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随着感情的升温,一天晚上,李婷直接拨打了“杨军”的电话,这让王芳惊出一身冷汗,连忙拒接。

眼看李婷开始生疑,王芳又生一计,买了一部带有“魔音”功能的手机,变成男人的声音,直接拨打了李婷的电话,让她放松警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婷又提出了见面的要求。看到李婷已彻底上钩,王芳开始了她的下一步计划。她告诉李婷,自己出了交通事故需到美国治疗,让李婷先汇5000元机票票钱一下急。李婷未作多想,立即将钱打到指定的账户上。

这一招,既骗到5000元钱,又躲过了见面要求,王芳都忍不住佩服自己“有才”。

### 令人震惊的真相

在随后的两三个月里,王芳故技重施,以自己在美国查出肝癌需治疗、换肝、奶奶做心脏手术等名目,累计从李婷那骗了20余万元。

离婚后的李婷,经济并不宽裕,为了不让“未婚夫”失望,李婷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钱。

而当李婷向“杨军”催还亲戚、朋友借款的时候,“杨军”却以各种理由推脱,李婷渐渐发现了不妙:一个家境殷实,自己又事业有

成的“帅哥”,怎么会向一个穷教师借钱?说是救急,事后怎么不及时归还呢?

冷静下来后,李婷发现了更多的疑点:“杨军”身在上海和美国,怎么会要求将款汇到本地银行的账户上?谈恋爱这么久,为什么“杨军”一直不肯和自己见面?他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怎么那么怪?

对李婷的质疑,“杨军”一直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直到此时,李婷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经过一番思考后,她最终在2011年年初报了警。

警方首先对“杨军”先前发过来的所谓“生活照”进行了查证,这一查让李婷惊呆了——照片中的人居然是偶像明星韩庚!

这戏剧性的一幕,立即让事件性质从恋爱中的经济纠纷转变成可能存在诈骗刑事犯罪案件。

警方发现,“杨军”的手机号码是李婷学校所在镇上的通讯店售出的不记名手机卡,也没有过漫游到上海、美国的记录。尽管没能查出机主是谁,但警方初步认定是李婷身边的熟人作案。而通过对“杨军”QQ上网记录的查询发现,该QQ一直在射阳当地登录上线,这更让警方确定了先前的判断。

在调取了李婷汇款账号的取款记录和取款时的监控录像后,李婷立刻辨认出是她的学生王芳!

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警察,王

芳很快交了自己的作案过程,并交代骗得的钱款已经被自己挥霍一空。而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作案手段,居然都是她从网上学来的。

### 年少无知的代价

法庭上,王芳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为自己年幼无知不懂法犯下的罪过向老师真诚忏悔。王芳的父母也向李婷表示了道歉,同时承诺将积极帮助偿还李婷被骗的钱款。

面对王芳的道歉,李婷表示无法原谅。

李婷觉得,因为这件事,自己的工作、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案发后,王芳及其父母仅仅归还了3万元钱,她向亲戚朋友借的巨款不得不由自己偿还。更为关键的是,自己出于对教育事业的负责,才对学生严管厚爱,一番良苦用心却换来如此结果,实在难以接受。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因王芳作案时刚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归案后又主动坦白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据此,法院一审判决王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非法所得17万余元责令退赔。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 新华时评

# 大病保障扩容体现了以人为本

记者5日从卫生部获得证实,今年我国将全面推开儿童白血病、尿毒症等8类大病保障,在三分之一左右的统筹地区将肺癌等12类大病纳入保障和救助试点。通过新农合与民政系统医疗救助的衔接,使重特大疾病补偿水平达到90%左右。

这是一项温暖人心的举措。一直以来,大病医疗保障是全民医保体系建设中的“短板”。由于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保障水平较低,老百姓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后个人负担较重,对于

很多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一旦患了大病,无异于一场灾难,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可能随着高额的医疗费用而被断送,患者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十分突出。面对大病,有数量庞大的患者在沉默、痛苦和绝望中煎熬,有些人因无力承担高额医疗费用而被迫放弃治疗。

我国肿瘤等疾病发病人数近年来增长迅速,而治疗癌症的很多药,医保原本并不报销。癌症中胃癌、肝癌、食管癌能报销的药物几乎没有,结肠癌是其中

能报销药物最多的,但只有3种药能报销。

提高重特大疾病的保障水平,不让大病患者“因病返贫”,是追求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在和谐文明的社会中,不应该有哪个人因为没钱救治而离世,每个患者都有获得基本救治的权利。将重特大疾病纳入全民医保范围,有利于从制度上筑牢、织密社会安全网,切实解决大病患者等特殊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给无数的大病患者及其家属带来温暖,带来生活的希望。经

过几年医改,我国城镇医保统筹基金已累计节余4015亿元,也有能力提高大病的保障力度,使城乡居民人人享有大病保障。

提高重特大疾病的保障水平,是一件大得民心的好事。如何把好事办好办实,还需要政策层面的具体细化。我们期待,有关方面积极探索大病保障制度的实现路径,早实施,早落实,尽早让大病患者沐浴到政策的阳光,从此不再因为疾病陷入绝望的困境。

新华社记者 王海鹰

## 热点纵论

# 让座还要给两块钱红包,没必要吧

近一年半来,在基江公交车上,给一位名叫代正兴的80多岁的老人让过座位的人,都会收到老人回赠的一个红包。红包里除了2元崭新的纸币,还有这样一张印有感谢话语的卡片。

9月1日,一名让座者在网上发帖公开了此事,贴出了老人送出的红包和卡片,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9月5日《重庆晨报》)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对“给让座者红包”的解读。但是,不管或赞或弹,代正兴老人的行为都属于个人自由。他给让座者的红包是掏个人腰包支付的,不涉及任何公共财政资金。同时他给让座者红包的行为属于赠与行为,受赠的让座者有拒绝的权利,并不存在强迫行为。既支配属于自己的资金,又不强迫别人接受,当事人给不给,给

多少都是外人无从干涉的自由。

虽然“给让座者红包”属于当事人的自由,但在老人自由行为的背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价值观念,即通过物质奖励的方式嘉许道德行为,值得好好议一议。正如老人自己声称的那样,对于让座的行为,他觉得光靠口头感谢还不够,还需要有表达谢意的物质载体,比如写有感谢话语的卡片、装有给让座者乘车费的2元钱红包,“希望他们坚持让座,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让座。”

事实上,被让座者有没有对让座者给予物质感谢,甚至是谢谢这样的口头感谢,对于让座者是否坚持让座并没有任何激励效应。因为,让座作为一种道德行为,其激励效应要来自自我的精神愉悦,比如我由于给别人让座感受到内心的安宁与快乐,

要么来自社会舆论对自己的精神嘉许,使自己在别人的认同中感到从事道德行为的价值。也就是说,一些日常道德行为更应与精神利益相联系,而不应降格为物质回报。

在现代社会,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在感叹,我穷得只剩下钱了。这样的感叹除了有某种炫耀的意味外,还从另外一个侧面折射出,在物质之外人应该有根本无法用物质来衡量的精神追求。现在,的确有一些人习惯于利字当头,这其实与社会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有很大关系,一事当前先问利害的功利主义思维模式,会将一切道德行为置于利益的考量之下,凡是无利可图的行为都有可能面临无人去做的尴尬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个体用物质奖励去激励道德行为

是一种无奈的话,那么制度层面用物质奖励去激励道德行为则是一种徒劳。一些道德问题的出现,原本就是功利主义价值观泛滥造成的后果,反过来用功利主义的物质激励来提升道德,岂不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对于诸如让座这样并没有任何风险负担的道德行为,若要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选择,最重要的是靠建立在社会共识之上的舆论压力,即一个在公众场合由于没有从事道德行为的人,总会感受到如芒在背的舆论压力,而这种舆论压力的形成,需要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支撑。在这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如何让这种超越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一个重大命题。

(志灵)

## 公民发言

# 滥权的“萝卜招聘” 勿拿母爱遮羞

为儿子“量身定做”公务员岗位,两度篡改分数助儿顺利“考上”公务员,后被网友举报,主动投案,被双开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9月3日,广东中山市“改分书记”梁国影受审。在法庭辩论中,梁国影的辩护律师表示,她“只是被母爱冲昏了头脑”。

(9月5日《中国青年报》)

用母爱来解释“萝卜招聘”,这无疑是对母爱的极大羞辱。每一个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前程。然而,如果是一个身为清洁工的母亲,她有能量将公务员考试的学历要求从本科降到专科吗?有能量将儿子的笔试成绩从104.1分改为109.7分吗?有能量通过“打招呼”使儿子得到91.74的面试高分吗?“萝卜招聘”的本质是权力作怪,拿高贵的母爱来勾兑,不过是一个试图减轻罪责的噱头而已。

如果说,山西长治公务员考试“体检门”所破坏的仅仅是体检一个关口,那么,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梁国影的权力之手,实际上已经在招考资格、笔试成绩、面试过程等诸多方面,严重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梁国影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这并非母爱有错,而是她必须为滥用权力触犯刑律而付出足够的代价。对官员而言,爱自己的孩子不是妄图“权力世袭”,而是要像平民百姓一样,教会自己的孩子拥有奋斗的能力和生活的智慧。以为权力和权力带来的灰色利益可以实现代际传递,这样的想法不是爱,而是在害自己的孩子。

针对律师所称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梁国影一案公诉人回应道,由于梁国影作弊,使原本考上了的考生被顶替了,无数的其他考生丧失了对公务员考试公平的信心,请问我们该可怜哪个父母的心?这样的反问,真有力。

(周东飞)